

中国同志群体生育现况与政策倡导

魏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围绕同性恋者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就是这一群体无法进行自然生育，并最终导致孤苦终老的结局。同性恋身份认同和生育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是近代以来从传统宗教（尤其是西方的基督教）和现代医学（包括之后发展的心理学）将同性恋建构为违反自然的“变态”行为的重要认识论基础，也是推崇生育的儒家传统影响下中国社会将同性恋边缘化，甚至予以排斥和压制的根本原因。随着人类迈入现代社会，生育（与否）不再是社会公众对于同性恋群体进行认知及其后续态度的唯一维度，但对于这一群体社会合法性的获取和赋予方面，特别是当代中国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之下，仍然具有突出的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和推广，生儿育女对于同性恋者而言，不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越来越多的性别多元个人和伴侣，通过使用辅助生殖技术，达成了为人父母，组建家庭的生活目标。¹尽管很大程度上还缺乏来自法律和社会层面的认知和承认，一个“彩虹生育潮”已经在中国社会悄然涌动。²同性育儿家庭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家庭多样化趋势的重要体现之一，而且与社会中不断涌现的其它亲密关系实践一起，将对中国社会中婚姻、家庭和生育等核心社会制度的运行和变迁产生重要的影响。

基于项目负责人及其研究团队过去十年的研究，此项报告将聚焦当代中国社会同志群体的生育现状，对其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报告将首先呈现同志群体生育实践在中国社会出现的背景。在对调查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进行报告之后，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呈现我们的调查发现：一方面，基于全国性大样本网络调查的结果，对于包括同性恋群体在内的中国性别多元群体的生育现状进行一个整体性呈现，并对其中反映出来的规律和趋势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基于对于同志育儿家庭的深度访谈和跟踪研究，结合个案访谈数据，对同志家庭的生育实践的特点及其在政策领域面临的机会和挑战进行分析。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近期的社会政治语境的变化，项目负责人尝试提出一些涉及政策倡导或者实施的建议，提供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参考。

¹ T. Biblarz and E. Savci . 2010 .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families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2) : 480 – 497; M . Moore and M . Stambolis - R uhstorfer . 2013. LGBT sexuality and families at the start of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9) : 491 – 507 .

² 魏伟. 2016. 同性伴侣家庭的生育：实现途径、家庭生活和社会适应，《山东社会科学》12, 75-82; W. Wei. 2021. “Queering the Rise of China: Gay Parenthood, Transnational ARTs, and Dislocated Reproductive Rights”, *Feminist Studies* 47(2): 312-340.

一、背景

和开篇提到的刻板印象相反，中国社会的同性恋群体一直都在生育。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讨论同性恋者的状况，来自社会和原生家庭的婚育期待是无法绕开的话题。人丁兴旺，子孙绕膝的父系大家庭，一直以来是受到推崇的理想家庭模式。在传统儒家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影响之下，同性恋者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和伦理压力。如果说视同性恋为巨大“原罪”的宗教保守力量及其对于法律政策的影响，是西方国家同性恋群体面临的主要挑战；父权制原生家庭对于子女传宗接代的期望和要求，则是生活在中国同性恋者主要的压力来源，并直接影响同性恋社群获得和提升社会合法性。³

尽管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包容度和接受度在进入21世纪以后有了显著提高，“同志”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本土同性恋身份认同已经得到普遍确立，但多数同性恋者仍然不愿向原生家庭袒露自己的性倾向。⁴当婚姻和生育压力非常急迫之时，不少同性恋者选择走进异性婚姻，以迎合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期待。很多情况下，异性婚姻的另外一方对于同性恋配偶的性倾向并不知情，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常常遭遇情感和身体的双重冷漠，酿成了不少家庭悲剧。⁵然而，在现代浪漫爱情观念的影响下，强调爱、性和婚姻的三位一体，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的传统选择，面临日益增加的道德和伦理压力。⁶关于同性恋者“骗婚”对配偶（特别是“同妻”）造成的身心伤害，不仅出现在各种媒体报道中，也引发了新的离婚争议的法律案件。

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为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同性恋者面临的特殊生育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是指运用现代医学技术和方法对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主要包括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I）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IVF-ET）两大类。⁷辅助生殖技术为应对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的不孕不育问题带来了福音，也因此带动了辅助生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全球范围之内，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诊所和其它相关服务机构，每年创造上百亿美元的业务：包括私人的精子和卵子库，代孕经纪服务，医学专科，卵子和精子的商业性捐献者，以及寻求服务的消费者。⁸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婴儿的同时，也能够生产新的社会关系。女性主义研究充分揭露了以利润为导向，日益增长的辅助生育产业如何嵌入在更广泛的经

³ W. Chou 2001. "Homosexu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ongzhi in Chinese Societ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0(3/4): 27–46.

⁴ 王晴锋. 2011. 认同而不“出柜”：同性恋生存现状的调查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4。

⁵ 邢飞. 2012.《中国“同妻”生存调查报告》，成都时代出版社。

⁶ 郭晓飞. 2009. 中国同性恋者的婚姻困境：一个法社会学的视角. 《法制与社会发展》4。

⁷ 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年2月20日，

<http://www.nhc.gov.cn/fzs/s3576/201808/99ad3444a14340e79c8361ee23b96251.shtml>, 2022年5月11日。

⁸ L. Mamo. 2013: Queering the fertility clinic, *The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34) p. 229.

济、历史和政治结构体系中，并生产新的社会不平等。⁹虽然异性恋夫妇是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使用者，性别多元群体近年已迅速加入其日益扩展的市场。这一技术不仅使同性恋者能够生育具有生物遗传关系的孩子，并基于这种血缘联系获得合法的生育权和监护权，还为他们提供控制生育过程的更多机会，涉及怀孕时间、选择卵子或精子捐赠者，以及特定的生育中介和方案。¹⁰

由于运用商业性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伦理矛盾和焦虑，各国政府对这类生育行为施加不同程度的法律限制。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国内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受到法律政策的严格限制。虽然“非正式代孕”在民间社会一直存在，¹¹但医疗机构实施代孕相关活动被明令禁止。¹²使用那些争议较小的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不孕不育的问题，目前仅对已婚的异性恋夫妇开放。除了那些选择“形式婚姻”或“合作婚姻”¹³的同志家庭可能通过此种途径合法拥有孩子，法定单身的男女同性恋者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则被排除在外。为了规避相关限制，一些同性恋伴侣或者个人前往允许其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育，但通常费用昂贵，也需要面临目的地国家法律变动的风险；另外一些同性恋者借助非正规渠道，通过地下辅助生育服务进行生育，但此种做法脱离法律监管，存在极大的法律、财产和安全风险。¹⁴

除了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和推广，中国国内人口政策的调整为近年来同志社群内部生育潮的涌动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推手。随着中国成为低生育率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了应对人口困境，中国政府在2015年对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不仅取消了独生子女的生育限制，而且减少了对非婚生育等过去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生育行为的束缚。¹⁵因为我国不承认同性婚姻或者伴侣关系，如果不选择进行异性婚姻（包括形式婚姻），同志家庭发生的生育很大程度上属于非婚/单身生育的范畴。按照新的法律规定，只要能够提供亲子鉴定，即便不是在婚姻中生育的子女，也可以依法进行户籍登记。这一重大的政策变动，为同志群体的生育解除了最为关键的制度

⁹ F. Twine. 2015. *Outsourcing the Womb: Race, Class, and Gestational Surrogacy in a Global Market*, New York: Routledge.

¹⁰ L. Mamo and E. Alston-Stepnitz. 2015. Queer Intimacies and Structured Inequalities: New Directions in Stratified Reproduc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6 (4): 19–540. M. Petersen. 2018. Becoming Gay Fathers Through Transnational Commercial Surrogac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9 (3): 694–695.

¹¹ J. Yang. 2015. Informal Surrogacy in China: Embodiment and Biopower. *Body & Society* 21 (1): 90–117.

¹²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规定：“存在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实施代孕技术、进行非医学指征的性别筛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的机构提供的精子的行为的医疗机构将被校检为不合格。”

¹³ 男女同性恋者为了应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彼此缔结的合法婚姻，相关研究可参见 S. Choi and M. Luo. 2016. Performative Family: Homosexuality, Marriage and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7 (2): 264; 王颖怡. 2014. 合作婚姻初探：男女同志的婚姻动机研究，《中国青年研究》,11。

¹⁴ Wei 2021.

¹⁵ 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问题》的举动意味着“计划外”生育问题得到解决，非婚生育的孩子之公民身份得以合法化。

性障碍，也激发了他们利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生育需求。中国政府于 2020 年进一步提出了“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政策方针。¹⁶虽然政府文件中并未就“包容性生育政策”做出任何解释，但来自学界、社会及政府部门对于相关政策的解读，普遍认可包容性生育政策内含对生育主体和生育行为多样化的接纳。¹⁷无论是从维护主体的生育权，还是从保障胎儿的生命权与生存权，抑或是从孩子的福祉出发，都需要尊重主体的生育意愿，消除政策本身给非主流育儿家庭带来的排斥与歧视。

和日益丰富的同志生育实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中国学术、法律和政政府对其的关注远远不足。同性伴侣家庭及其生育实践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中均处于被边缘化、被忽视的状态。在中国，由于缺乏关于同志群体整体生育状况和具体议题的扎实研究，从政策的制定者到普通民众都难以全面客观地了解相关事实（包括基于不了解而产生的污名），此种状况不仅影响了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基本权益保障，也妨碍了公共部门更加合理地开展行动。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此项调查研究希望能够揭示同志群体的生育现状，并为已经或者即将在性倾向和性别认同领域开展工作的部门和机构提供相关的基础性数据。同时，项目负责人也希望公众通过我们的调查，有机会了解同志群体的生活状况，从而推动社会环境的改善，促进这一群体及其家庭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

二、数据来源

中国城市中新近出现的同性育儿家庭，是项目负责人及其研究团队过去十年的研究重点。此项调查报告的写作，基于我们利用不同研究方法收集的两个数据来源。我们希望这样一种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能够对于目前中国性别多元群体的生育状况提供一个全面和深入的呈现。

此项报告的第一个研究数据，来自魏伟和汪佳瑜在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2 月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性别多元育儿家庭进行的一项非代表性在线调查。调查的参与者是在非异性恋关系中抚养后代并自我认为是性别多元群体的父母，包括与子女存有基因联系的亲生父母，在中国法律下与子女具有法律关系的法定父母，以及与孩子没有基因联系和法律关系但参与抚养孩子的社会父母。在线调查的内容，包括参与者的社会人口信息、生育动机和手段、家庭形式和关系、抚养子女的支持和挑战。受访者通过手机或电脑在线填写，并提交调查问卷。他们还被邀请将问卷转发给他们个人网络中的其他性别多元父母。12 个中国有影响的社群组织和意见领袖，帮助我们将调查进行了宣传和推广，最后总共收集到 595 个有效的调查样本。

项目负责人近年来对同性育儿家庭父母的深度访谈和跟踪研究，构成了此项报告的第

¹⁶ 参见《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构建综合生育支持体系》，《中国青年报》2021 年 2 月 22 日；杨舸：《“十四五”生育政策为何首提“包容性”？人口政策将转向何处？》，《光明日报》2020 年 11 月 9 日。

¹⁷ 杨菊华. 2021. 生育政策包容性：理论基础、基本意涵与行动策略.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5 (3) :75-85。

二个数据来源。自 2016 年开始，魏伟在长三角地区和成都对同性育儿家庭的一至两位家长进行了面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参与者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招募：一个是同性恋亲友会（现更名为“出色伙伴”）及其在上海和四川的分支机构，另一个是一个由两位拉拉母亲创建的在线社区“彩虹宝宝”，主要为中国和世界各地养育孩子的女同性恋家庭提供交流平台，迄今共完成对 11 个拉拉育儿家庭和 12 个男同育儿家庭的访谈和回访。

三、整体现状¹⁸

项目研究团队开展的性别多元育儿家庭的在线调查，历时 3 个月，共回收问卷 704 份。研究团队经过对问卷的完成度、填答质量以及是否符合研究对象要求的检查，最终保留有效问卷 595 份，有效问卷率为 84.5%。本次问卷调查的有效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除西藏、宁夏和新疆外的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还有一些填答者现居住在国外（仍是中国国籍故决定保留）。拥有父母身份的性别多元群体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占比 64.8%，其中来自北京、上海和广东的性别多元父母占比达 42.5%，广东为性别多元父母首要居住的省份。来自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性别多元父母分别占比 15.0% 和 20.2%，两者占比的差异主要来源于西部的四川，近 10% 的性别多元父母居住在四川。性别多元父母的此种地域分布与各地的针对性别多元家庭的制度和文化包容性密切相关。

表 1 显示了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人口社会属性特征。问卷填答者的平均年龄为 36.3 周岁，“80 后”占性别多元生育群体的大多数（69.4%），“90 后”和“70”后占比相近，分别为 15.9% 和 13.9%，60 后及更年长的受访者占比仅有 0.8%。从样本的户籍类型和收入情况来看，性别多元群体的生育行为更多的是一种城市中产阶级行为，超八成的样本户籍类型为非农户口（包括现统一为居民，之前户口为非农业的样本），样本 2019 年平均收入达 34 万，远超于 2019 年全国人均年收入水平（30733 元）。高学历水平成为性别多元父母的另一显著特征，超九成的受访者具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近三成的受访者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远高于全国平均受教育水平（15.5% 的大学文化程度）。性别多元群体成为父母的平均年龄为 32.14 岁（领养的按实际领养的年份，而非孩子的出生年份估计）。相比于异性恋群体，性别多元群体生育孩子的时间更晚。表 2 显示了性别多元父母的性别认同与性倾向的构成情况。拥有父母身份的性别多元群体在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的构成上均比较多元。从性别认同情况来看，性别多元群体的生育行为以顺性别女性为主要实践主体，占比 56.0%，其次为顺性别男性，占比 38.2%；在跨性别群体中，跨性别女性的生育行为明显多于跨性别男性，两者分别占总样本的 4.9% 和 0.5%。从性倾向的构成情况来看，性别多元父母主要认同为同性恋，占比 79.8%，其次为

¹⁸ 本部分的主要发现均引自魏伟和汪佳瑜 2022 年合作完成的《中国性别多元群体生育实践调查报告》。

表 1 样本基本社会人口特征表

样本基本社会人口特征	全体样本 (N=595)
年龄 (均值)	36.3
年龄 (%)	
90 后	15.9
80 后	69.4
70 后	13.9
60 后及更早	0.8
户籍 (%)	
农业户口	10.1
居民, 之前为农业	8.4
非农户口	54.5
居民, 之前为非农	27.1
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	2.4
高中或职高	4.7
大学本科或专科	64.9
硕士及以上	28.0
年收入 (万)	34.0

双性恋，占比 15.3%；此外还包括比例较低的异性恋、性倾向不确定者和酷儿。需要指出的是，性别认同与性倾向两种分类方式并非互斥，而是存在交叉的情况，如性别多元样本中包括少量异性恋者，其性别认同为性别多元群体，但在性倾向上是异性恋。

调查对象的生育方式是我们在线调查关注的重点之一。问卷询问了填写者是在哪种情况下成为了现在第一胎孩子的父母（最年长的孩子或最先领养的那个孩子）。由于不同生理性的性别多元群体在成为父母的方式上存在差异（比如男同性恋群体无法通过他人捐精自主生育孩子），本报告按照生理性别报告性别多元群体的生育方式，具体结果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性别多元男性最主要的生育方式为代孕，其次为形婚生育，近 60% 的男性通过代孕生育了第一胎孩子，有 17.5% 通过缔结形式婚姻生育了第一胎孩子。性别多元女性最主要的生育方式为捐精生育，近 72% 的女性通过捐精生育成为了第一胎孩子的父母。在不同类型的捐精生育中，又以国外捐精生育为主（50%），其次为民间捐精生育（15.5%）和熟人捐精生育（6.6%）。对比不同生理性别的性别多元群体的生育方式可以发现，男性更有可能通过主流生育方式（法定婚姻框架内的）成为父母，其通过形婚以及和异性恋结婚生育的比例均高于女性。

表 2 样本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构成表

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构成	全体样本 (N=595)
性别 (%)	
顺性别男性	38.2
顺性别女性	56.0
跨性别男性	0.5
跨性别女性	4.9
酷儿	0.5
性倾向 (%)	
同性恋	79.8
双性恋	15.3
异性恋	2.5
不确定	2.2
酷儿	0.2

总体而言，无论对于何种生理性别的性别多元父母，在法定异性婚姻框架内生养子女，均非主要选择，相比之下，参与者其更偏好借助辅助生殖技术生养子女。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规范将血缘联结视为定义家庭的关键要素，性别多元伴侣家庭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法律上均得不到认可，此时血缘联结的存在是确认性别多元者和孩子之间亲子关系的意义象征，加之性别多元群体在收养孩子时面临诸多的结构性障碍，对于具备经济实力的性别多元父母而言，代孕和捐精生育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图 1 性别多元男性实际生育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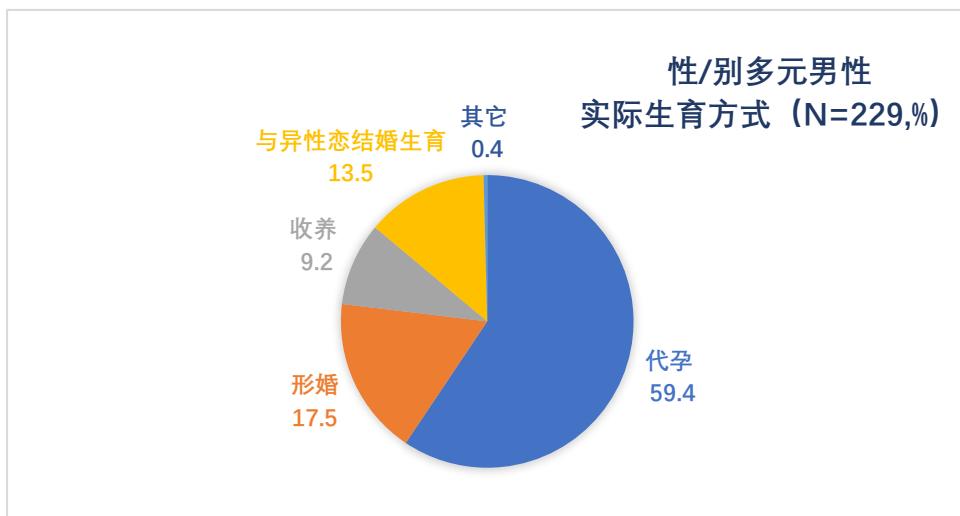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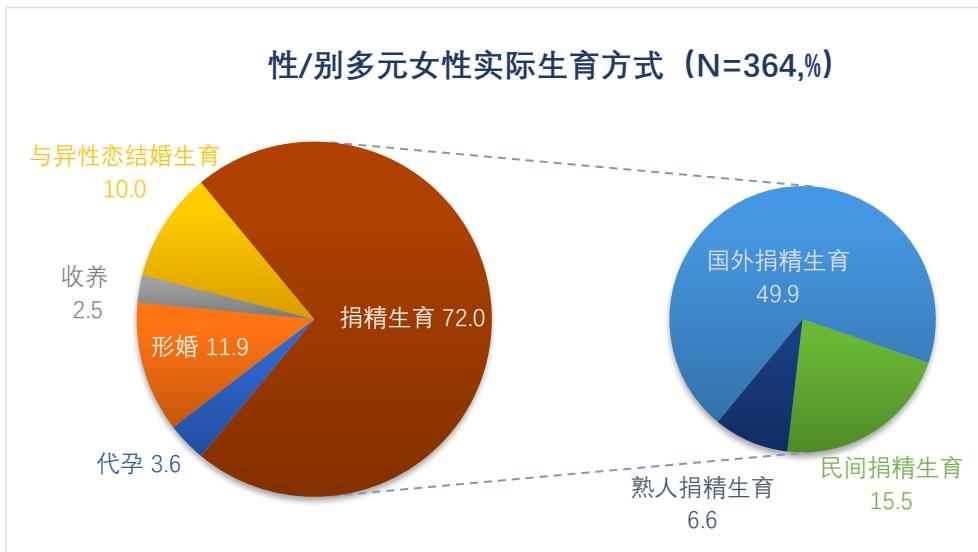


图 2 性别多元女性实际生育方式



从生育结果看，每个性别多元家庭平均育有 1.3 个孩子，独生子女家庭（育有一孩）构成了主要部分，占比达 77%；其次为育有二孩的家庭，占比为 20%；育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占 3%。通过询问独生子女家庭孩子的生理性别情况，显示总体性别比为 121。这一一定程度表明，类似于异性恋家庭，性别多元家庭也存在男孩偏好。进一步区分不同生理性别的性别多元家庭的一胎性别比可以发现，总体失衡的性别比由男性家庭极端失衡的性别比（206:100）造成；女性独生子女家庭并不存在男孩偏好，相反有一定程度的女孩偏好（90:100），显示同性伴侣往往更喜欢生养相同性别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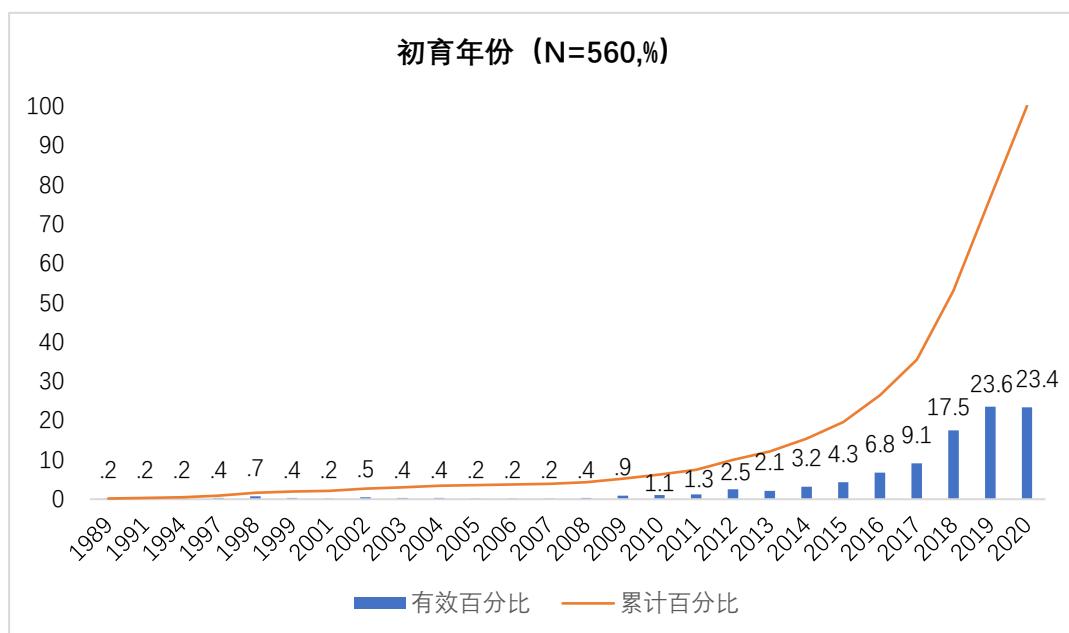
表 3 性别多元家庭子女数及性别比

子女数及一胎性别比	全体样本 (N=595)
子女数（均值）	1.26
子女数 (%)	
1 个孩子	77
2 个孩子	20
3 个孩子及以上	3
一胎性别比（仅指一孩家庭）	121
性/别多元女性家庭一胎性别比（仅指一孩家庭）	90
性/别多元女性家庭一胎性别比（仅指一孩家庭）	206

参与 2021 年网络调查的性别多元家庭，养育的第一胎孩子的年龄平均值为 4 岁，众数为 2 岁，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32 岁和 1 岁。结合图 4 显示的性别多元家庭的初育年份百分比情况（初育年份指性/别多元父母开始养育孩子的年份，以一胎出生年份或领养年份为准），可以发现，在 2010 年以前，性别多元群体的生育行为还属于个人行为，尚未形成群

体效应，仅有 5.2% 的生育行为发生在 2010 年之前。2010 年，性别多元群体的生育行为开始兴起，并呈现逐年递增样态，但直到 2016 年，增长速度均较为缓慢。2016 年及之后，性别多元群体生育实践迎来快速增长，在该阶段进行生育行为的家庭占比高达 81.4%。为了应对中国人口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中国在 2016 年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并放松了对非婚生子的户籍登记限制，新政在性别多元社群内部被广泛解读为一个利好消息，并促成了更多同志做出生育决定；由此我们也窥见了政策层面的变化对性别多元群体生育行为的巨大影响。

图 3 性别多元父母的初育年份



四、同志群体生育的机会和挑战

(一) 辅助生殖

当代中国同志身份政治需要调和同性欲望与社会规范。同性恋群体极力渴望“成为正常人”和实现性身份主流化。¹⁹植根于儒家传统文化，孝的核心是确保姓氏和血统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为了满足家庭和社会对“正常生活”的期待，虽然中国同志面临结婚和生育的压力，“默言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提供了包容和认可。过去中国同性恋者最普遍的生育途径是通过异性婚姻；现在这种行为被称为“骗婚”，同性恋者与不知情的异性伴侣结婚备受社会道德谴责。²⁰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对同性恋接纳程度的提高，使得在同性恋身份及关系的背景下建立家庭和生育子女成为可能。然而，中国国内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受到

¹⁹ E. Engebretsen. 2014. Queer Women in Urban China: An Ethn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²⁰ J. Zhu. 2017. Unqueer Kinship? Critical Reflection on ‘Marriage Fraud’ in Mainland China. *Sexualities* 21: 1076.

法律政策的严格限制。²¹使用那些争议较小的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不孕不育的问题，目前仅对已婚的异性恋夫妇开放。除了那些选择“形式婚姻”或“合作婚姻”的同志家庭可能通过此种途径合法拥有孩子，法定单身的男女同志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则被排除在外，他们只能通过其它途径获得辅助生殖服务，从而达成生育的目标。

如果从大学时代作为一个宿舍的室友算起，宏飞与燕清住在一起已经超过18年了。他们在2019年夏天接受魏伟访谈的时候，正在等待带有各自精子的受精卵，植入美国的代孕母亲体内。燕清在一家美国公司的中国分公司工作，经常到美国出差。在与一位美国经纪人精心准备后，这对男伴侣启动了他们通过跨国代孕生育子女的计划。当问及选择美国作为跨国代孕的目的地的理由：

“我们当时也讨论了一下，我的想法是在美国的法律风险小一些他们这边流程比较正规，然后像获取身份，以及对方的孕母放弃（监护人）身份都有一套比较正规的法律流程……当然还有一个选项是泰国，但是泰国有些人说也是会有一些法律的风险。综合考虑美国这边法律风险比较小，虽然费用是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法律风险比较小，这是我们考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宏飞）

虽然代孕母亲那边进展顺利，但是2020年初意外到来的全球新冠疫情，给宏飞和燕清在内的许多正在进行跨国辅助生育的中国大陆同志父母们带来了麻烦。幸运的是，两人辗转到达美国迎接了孩子的出生，并于当年9月带着龙凤胎子女返回中国，然后经过两周隔离后回到了上海的家中。

相比宏飞和燕清名牌大学的教育背景和跨国公司的职业经历，月芳和阿春是来自苏南农村的一对拉拉伴侣。对于两人的关系，虽然月芳的家人极力反对，甚至为此要断绝关系，但阿春的母亲却接受了这对伴侣，并在村里为她们举办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在做出生育决定之后，月芳和阿春就开始通过网络寻求可行的生育方式；从自身的情况出发，两人最终选择了“民间捐精”²²这一方式。

月芳：“我们是在网上查的。有这样的拉拉生育群，然后我们就进群了，然后进去之后就了解。我们运气也算好的，进去之后这里面的人也都不认识，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么直白的分享。有一对福建的拉拉已经成功生育了，然后就分享需要注意的事情呀，或者是要怎么操作呀，跟我讲的蛮多。其实也有好几种方式，一种是‘熟人捐精’，这对就是一位生育了她对象的兄弟的，所以有点血缘关系。我们本来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妈这个情况，我弟弟还太小，我怕到时候他告诉我妈，她要给我拼命了。这个问题我弟弟本来是愿意的，当时他才十七八岁。我怕万一没成年，可能涉及到法律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就pass掉了这个想法。去网上随机找，找了之后体检。

²¹ Y. Liu, X. Xian and L. Du. 2022. Perspectives on Surrogacy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A Content Analysis of Microblogs on Weibo. *Yale Journ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95: 305-316.

²² 参见同语. 2016, 《国内非婚女性生育状况调查报告》

阿春：“有很多人会做这种事情，至于什么目的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只是想要他的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啊，然后就行了，我们只能保证这些，因为在国内毕竟这个是不合法的。见面的时候，我们不是选择各自的城市，而是一个中间点的城市。而且，是她去见，不是我去见，我们不会让他知道是我要去生孩子。一般拉拉操作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会让男方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人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个男孩是一个大学生，纯粹就是赚点钱嘛，缺钱呗。

月芳：“就花了几千块钱。”

阿春：“但是我们是一次成功的；如果一次不成功，那他还要再配合。酬劳方面，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因为我们一次就成功了。如果是多次的话，就不知道是多少钱了。”

阿春顺利生育了一名男孩。她的母亲因为还需要打理家庭的养鸡场，就无法帮助这对伴侣照料外孙，就帮助她们出首付在城里买了商品房。孩子出生之后，这对拉拉伴侣生育之路的挑战并没有结束，我们后面还会遭遇她们的故事。

辅助生殖技术不仅能够帮助同志生育具有血缘联系的子女，也能够用于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符合主流规范的家庭形态。A 卵 B 怀（ROPA, reception of oocytes from partner）是女同性恋利用辅助生殖技术，打造的独特的辅助生殖实践，即妊娠母亲接受其伴侣的卵子，使得伴侣双方能够分享生物学母亲的身份。A 卵 B 怀这一新兴的生育模式，对于中国的拉拉群体有较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在重视亲子之间血缘联系的中国社会，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可以生下与两个人都有象征性联结的子女，这不仅对于维系拉拉家庭的稳定和谐非常重要，同时也挑战了异性恋家庭的正统规范——即孩子只有一个“真正”母亲。²³大芸就是通过 A 卵 B 怀的模式，由其伴侣生育了一对儿女，两人分别为这对儿女的基因母亲。

“选择一儿一女，很好理解；因为可能女儿要好看，因为我对象肯定比我好看，所以当时就觉得他要女儿。我们首先是希望是一儿一女，这样大家比较齐全比较圆满。另外一个我也比较尊重她，大家都要有自己的小朋友也很正常，如果都是某一方的，我也觉得不那么公平。另外一个男孩子我觉得长相可能没那么重要，但是我希望他聪明一点，就是因为男人一笨给人感觉就很差，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我的基因可能就是给男孩，然后我对象的基因给女孩。”

与此同时，A 卵 B 怀的生育安排下有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即在生育实践中双方不对等的身体劳动与生育风险。目前拉拉母亲仍处于边缘位置，面临着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法律并不承认她们的伴侣关系，她们与子女的关系也无法得到制度性的确认，她们的家庭实践只是一种“承诺”。因而 A 卵 B 怀的模式只是一种“想象的平等”，存在着潜在的不公甚至剥削，

²³ H. Yao, J. Yang , and I. Lo. 2023. Lesbian couples' childbearing experiences us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 netnography study. *Midwifery* 1;121.

因为承担着生育责任的一方，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更大精神和身体上的压力、苦楚和风险。在中国女同性恋亚文化中，T/P 是常见的性/别角色标签，因为她们在角色关系、性活动中的不同位置，P 被认为是更具有“女性气质”的一方。而在社会文化中，怀孕、分娩等母职相关的活动通常都与女性气质高度联系在一起。学者在其网络观察的经验材料中发现，往往是 P 的一方承担着分娩责任，并进一步认为拉拉伴侣复制了异性恋的关系模式和权力关系，在缺乏制度性的确认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承担分娩责任的母亲可能面临着“免费代孕”的困境。²⁴

辅助生殖技术同样可以用于强化男同伴侣育儿家庭中的关系联结，正如阿中在访谈中兴奋地分享的那样。

“因为其实你知道，很多同志是代孕的成功经历是很低的，而且我们更神奇的是说我们是用同一个 donor，然后我们俩分别两个精子受精嘛，然后同时植入一个代孕妈妈的子宫里，后来他们一次性居然都成功了，对，而且是龙凤胎。我们的血缘关系就是，他跟他的孩子有血缘关系，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是有血缘的，我的孩子跟我是有血缘的，所以我们就这样连成一个家庭，因为他们是一个 donor。也就是同一个妈妈，然后在同一个子宫里长大，所以他们有 50% 的血缘，然后分别跟各自的爸爸有血缘，所以血缘串成了我们一家。”

随着一些同志名人的示范效应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同一个捐卵者，同一个代孕者，两个孩子和两个基因父亲”日益成为男同辅助生育的“黄金标准”，²⁵成为很多男同伴侣模仿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生育安排的确满足了男同家庭对于“理想家庭”的追求和模仿，但对于代孕母亲而言，则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同志生育欲望的实现不是个人意愿的纯粹结果，而是涉及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联资源的全面动员。参与我们研究的同志生育群体，几乎都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尽管参与我们网络调查的所有人的年均收入为 34 万元人民币，但选择不同生育方式的参与者的年均收入差异极大。以男同为主选择跨国代孕生育的参与者年均收入为 65.3 万元，相比选择国内（地下）代孕生育的年均收入为 49 万元。以女同为主选择国外捐精生育的参与者年均收入为 30.9 万元，与之相比，选择熟人捐精生育和民间捐精生育的年均收入分别为 22.8 万元和 18.4 万元。此外，是否有能力选择辅助生殖技术进行生育，更能反映同志生育群体的收入差异。与上述选择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参与者相比，不限性别的选择收养的年均收入为 27 万元，选择形式婚姻生育的年均收入为 21.8 万元，而通过异性婚姻生育的参与者年均收入最低，仅为 17.5 万元。²⁶除了更高的经济收入，很多选择跨国辅助生育的参与者也拥有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教育和职业优势，参与我们深度访谈的很多受

²⁴ H. Zheng. 2022. Shared Motherhood or Free Surrogacy? Risk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a Chinese Lesbian's Family-Making.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9(11):1881-907.

²⁵ C. Russell. 2018. Rights-holders or refugees? Do gay men need reproductive justice? *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and Society Online* 7: 131–140.

²⁶ 魏伟, 汪佳瑜. 2022. 《中国性别多元群体生育实践调查报告》。

访者都在西方国家获得硕士及以上的学位。通过跨国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这些同志将自身积累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向生育资本的转化，拥有了其他普通民众（也包括绝大多数的同志社群人士）无法获得的生育选择，并最终实现为人父母的愿望。

同性伴侣家庭生育的子女，通常无法和伴侣双方同时具有血缘的联系。因此，血缘对于界定和认知家庭的主导性意义，一直以来都是性少数家庭实践作为“选择的家庭”致力挑战的社会观念。尽管研究显示同志伴侣育儿家庭中有意淡化血缘的影响，辅助生育在同志社群中的兴起，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偏爱血缘联结的结果。即便在国内面临诸多限制，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生育血缘后代的可能性，是造就中国目前的“同志生育潮”的直接原因。即便那些没有能力或者机会做出此等选择的性少数人士，很多也向往这样的生育方式。为了解性少数群体对不同生育方式的偏好以及实际生育方式与理想生育方式之间的差异，我们的大样本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了如下问题：“如果再选一次，您最倾向于通过何种方式成为父母？”结果显示，性少数男性选择代孕是最理想的生育方式，占比达 68.9%；其次为收养，占比为 11.8%。性少数女性选择国外捐精生育是最理想的生育方式，占比为 57.1%，其次为民间捐精生育和代孕，占比分别为 14.1% 和 13.2%。同志群体对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达成生育目标的偏爱，显示对于血缘联结的重视。²⁷

无论是作为个体经验，还是行业发展，中国同志社群通过辅助生育成为父母，远非一路坦途。由于地处法律规范的“灰色”地带，辅助生育的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虽然部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同志能够追求这一生育选项，但他们的选择仍然受到技术水平、经济成本、日常恐同文化和异性恋规范体制等的共同限制。Dylan 的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的生育经历，就是这些多重限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了把孩子顺利带回国，当时 2014 年的泰国在抓这个事情，政策上已经把（跨国代孕）定为非法，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安全的办法把孩子带回来。那个时候正好是风声鹤唳的阶段，可能后来还松快点，当时特别严。我就想到跟妈妈把结婚证扯了，扯结婚证的同时也把离婚协议写好了，然后隔了两年我又去把离婚办了，所以我在官方的来看数据的话，我是离异状态……记得代孕母亲怀了大概四五个月的时候，我还在美国玩，然后收到邮件就是说泰国在抓这事儿了。当时因为 2014 年正好是年终的时候，出了日本跟澳大利亚的两个代孕丑闻，是然后就说在抓这个事，（跨国代孕）立马就变成非法了。当时我签的那家公司也遣散了，只有一个客服留下一些信息，然后我当时想我能怎么办，这事我也没法控制，对吗？你就好好照顾自己，听天由命。我当时想法就是听天由命，这是第一；后来觉得好像还行，代孕母亲慢慢自己在家待产的。生孩子之前一个月，代孕妈妈出现了妊娠高血压，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妈妈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当时三十五六岁了，就已经不是好的年纪，但我后来一想，中介可能就是选择这种相对便宜的代孕母亲，或者是愿意干这个的 20 多岁的女孩少。高血压需要住院，然后让我出医药费什么的。我就赶紧打电话，让我在曼谷的朋友给我去结账，然后我在中国把钱再转给他的中国账户。”

²⁷ 见上。

正好赶在 2014 年泰国禁止跨国代孕的法律出台之前，我们的一名访谈对象晖幸运地将双胞胎孩子带回中国，但对于那些想和他选择相同代孕道路的男同志而言，他提醒泰国不断变化的当地法律为他们的选择增加了更多的风险。

尽管技术进步和跨国流动提供了新的生育机会，但对于许多性少数父母，法律仍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域。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性少数者仍必须在复杂的国外法律体系中斟酌，这些法律通常以异性恋规范为基础且不断变化。例如，鉴于当地深厚的恐同传统和政策，以俄罗斯和其它东欧国家为代孕目的地的公司提供的一项服务，就是协助同志客户和当地人士缔结虚假异性结婚。虽然可以享受在辅助生育方面相对发达的医疗设施和相对低廉的服务价格，但无疑增加了更多财产甚至人身安全的风险。在访谈结束 6 个月后，另外一位访谈对象 Don 终止了和赴美代孕生育的中介公司的合同，尽管他已为前期流程支付了 50 万元。他指责该公司没有提供承诺的优质服务，导致了 IVF 周期的失败。鉴于当今中国法律有关代孕的限制性规定，和 Don 有相同经历的同志意向父母无法向有关部门寻求问题的解决。除了辅助生育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之外，对于同志社群乃至整个社会，围绕生育权、健康和正义的道德争论还远远没有平息。

（二）户籍登记

中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并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在随后数十年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生育观念和实践。包括单身生育在内的非婚生育，作为计划外的生育活动，遭到明令禁止；一旦违反，可能面临开除公职或交纳数额巨大社会抚养费的惩罚措施。由于同志群体在法律上无法成婚，在法定单身背景之下生育的子女无法进行合法的户籍登记。这曾是中国同志群体生育之路上面临的最为主要的制度性障碍之一。然而，在人口增长缓慢，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于 2015 年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减少了非婚生育的政策性束缚。

小美从外地来到伴侣居住生活的城市，将生育的孩子落在了伴侣的名下，平日里也是由伴侣的父母帮助照看小孩。她们的儿子在 2014 年出生，当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

“因为这个之前确实是要交罚款，我们那里要交十多万的罚款，然后我们就给他拖了一年。直到 2015 年才去上的户口，结果只交了 3 块钱的工本费，因为我宝宝特别乖，然后去抱过去的时候，哎呀是单亲，那个男的跑了。未婚先孕的那种，办事的那个人就特别感性地说，这么乖的宝宝，怎样怎样的，然后就给她办理了，只花了 3 块钱的复印的钱。”

小美的经历并非个案，在泰国进行跨国生育的 Dylan，虽然有了和泰国代孕母亲之间名义上的婚姻，由于没有生育之前没有履行相关的手续，也被卡在了“计划外生育”上，而无法给儿子进行户籍登记。

“在国内遇到的障碍，就是我提前没有想到；其实可以预先知道，只要有人跟我说，比如说回来我去上户口的时候，就发现我三四条要求都无法满足。当时还要罚款，2014年底你就要交社会抚养费，还没有生育证。你虽然拿了个离婚证，你这是先生再结的，也算是非婚生子女，要交罚款抚养费。没办法，黑着孩子从14年底一直黑到了18年快4岁了。2016年之后，不就是放开了生育？罚款这件事没了。我说我这种心大，也是有好处的；当时没马上去解决问题，好在这个事后来就自然解决了。”

根据我们的网络调查的结果，性别多元家庭第一胎孩子的落户情况，88%的孩子落户中国，8%的孩子拥有外国国籍，但还有4%的孩子调查之时还无法落户。在拥有外国国籍的宝宝中，又以美国国籍的宝宝为主，占比达75.6%。总体而言，在国家调整生育政策之后，同志家庭的孩子较少面临“黑户”的问题，但不包括生育方式为“领养”的父母。参与我们网络调查的同志父母中，领养的比例不高，但其中超7成的家长面临孩子落户的困难。²⁸虽然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是否单身并无限制，同志群体可作为单身人士收养子女，但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通过领养成为父母面临的制度性挑战其实是最大的。因为按照2016年之后户籍登记的规定，只要能够提供与孩子之间基因联系的证据，即便属于法定单身的情况，也能够为子女进行户籍登记。然而，对于选择领养的同志父母，由于不能提供基因联系的证据，在当前的制度之下反而遭遇了新的困难。

虽然政策空间打开了，子女落户的困难仍困扰着参与我们网络调查的部分性别多元家庭（14.2%），具体表现为落户时间之长和落户费用之高。对于选择了“孩子落户的困难”这一主要挑战的填写者，其落户所用的时间从1个月到5年不等，平均时间为10个月，有17.2%的该部分性/别多元家庭的孩子至今未落户；落户所花费的费用从0到40万不等，平均费用为4万左右。²⁹前文提到的月芳和阿春这对拉拉伴侣，虽然她们的儿子在2016年之后出生，但在当地上户口的时候，依然碰到了问题。

月芳：“生完孩子建户口又遇到了问题。因为我的户口在我的老家嘛，然后按照正常程序，先去村上开证明，要结婚证，但我们没有。当时我那边没有全部出柜，我不可能去讲，我是这种情况，是吧？没有结婚证不给开，直接就不给，然后我就气的呀，气的不得了。我也不知道当时她是怎么想的，让我打市长热线12345

阿春：“16年二胎政策开放，不允许有黑户，我就知道这个信息。我就让她打的。”

月芳：“那边说你的户口在这边，你就带着户口本和小孩的出生证明直接去派出所。然后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去了之后，那边户籍办的人让我去弄证明，我说我没有，他说意思是不可以报。然后我说我已经打过城市热线，她说哦。那等会儿就在边上打电话到我们村上，他说家都32岁了，好不容易生个孩子，你们怎么不给他上户口呢？人家电话都打了市长热线。现在是不允许有黑户的，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只是通知你们一下，不需要你们的证明了，我们这边直接给她上户口了。然后就办好了。”

²⁸ 魏伟，汪佳瑜. 2022.《中国性别多元群体生育实践调查报告》。

²⁹ 见上。

通过拨打市长热线，这对农村拉拉解决了孩子的户口问题。这一个案也表明政策落地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同志父母和基层的管理者展开积极的协商。

由于目前同志社群普遍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而相关技术及其人群适用在中国面临诸多限制和争议。根据我们的访谈发现，虽然现在关于非婚生育有了新的政策规定，整体上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但在涉及辅助生育的时候，也会受到所在地户籍管理部门的办事人员的影响。虽然自己的孩子是在美国出生，但为了在国内入托上学的便利，燕清也曾做过户籍登记的尝试。

“我曾经尝试去上过（户口），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是郑爽的那个事情刚出来。派出所的人第一句就问我：你是不是代孕的？我就哼哼的没有说。他说如果你是代孕的，你就不用过来。他说你也知道郑爽的事情，然后我说明白了，也就走了。后来，其实我跟他（宏飞）商量了一下，觉得其实我们本来也没有想走公立学校的路线，所以户口好像也没那么重要，所以也就没有去弄了。”

来自同一城市的不同行政区的达宁，却有着不一样的经验。他生活的这个行政区涉外程度很高，有相当数量的外籍人士在此工作和居住。

“我们这个区海外出生，办中国户口的人太多了。那一年的风向标不是很鼓励，不像现在，所以我去街道上户口的。我还认识人。街道上户口的时候，他是这么跟我说要看出生纸，他们很怪的，一看出生纸，只有父亲一个人。只有父亲，不能提供母亲，我就直接是作为代孕？人家直接说的，你同不同意？同意。他说你代孕协议有吧？材料我都准备好了，我一次性交完都有了，对吧？我那本代孕的合同，需要翻译的，中国要翻译件了，什么指定的一套东西，全都准备好了。窗台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很年轻的，他们好像也见怪不怪，因为这个区可能是涉外的比较多一些，对大家都觉得很 nice。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很多不友好的对待。虽然拖了一年，没有任何不友好，可能郊区会不一样一点，因为那边可能见的少。里面的办事民警，一个女的跟我说，这个事情很正常的。我们很多的，但是现在每个区的名额（因为涉及婴幼儿的疫苗服务）有限，所以你只能排队。我并不违法，在国内想让我提供的一切证明，我都有；没有一样证明是提供不出的。这个孩子的来源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如果你不给他上户口，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你想刁难，也刁难不了我。当然我也很客气。”

达宁接着又分享了当地政府在开展相关管理工作的一个新的“创新”。

“等我上完户口，本市公安局专门有一个上户口的指引，针对代孕情况的落户指引，提供了一个报户口的流程。我看到人家朋友圈发出来的，专门针对你这一类人有一套指引的，他还要做笔录，这个孩子你怎么来的？民警说更多的怕你是对于女性的权利侵害，你是不是？万一这个妈妈没有放弃抚养权，你现在突然之间这个孩子上你这边户口，怕有这样的纠纷，所以他们特别谨慎。我找了一个靠谱的中介，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鉴于代孕活动在中国法律和社会层面的争议，以及客观存在的庞大需求，相关部门对其管理进行制度化的尝试，值得进一步关注。

(三) 生育福利

孩子出生之后，除了户籍登记，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个新的需要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环节就是生育福利的享受，主要是关系到母亲本人产假和育儿假。在户口登记已经变得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与生育权益相关的津贴、产假等问题则让很多性少数母亲感到沮丧。³⁰许多地方政府仍然将非婚生育的女性排斥在权利享受范围之外，将生育相关福利与结婚证挂钩，非婚生育的母亲也只能获得基本的98天产假；只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才能获得额外的80天奖励假。

拉拉母亲 Sandy 分享了她在申请生育福利的问题上遭遇的麻烦。³¹

Sandy：“我就当时一直办不下来这个生育服务单，就是怎么着都弄不下来，必须要填男方信息，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你怎么跟人家解释，怎么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文件打印出来都不行。然后这造成了我没法走这个生育保险，就我全程都是自费的一个状态，包括我后面住院都也不能走生育保险。然后我在上户口的时候也面临这个问题，嗯，我这怎么跟人家解释我为什么没有进服务单都不行，人家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其实我当时是还想我生活的城市应该是有很多非婚生育、单身生育的，但是为什么就说他们那片区这是第一例呢？然后各种资料，反正就折腾得我去了派出所好多趟，然后我还打印了相关的各种国务院的条文或者国家政策这些的跟人家解释，然后反正最终是办下来了。经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坎坷的过程，人家还上门来这个家访，然后反正就经历了很多各种不正常的程序，总归也是办下来，但肯定也是不没有像就正常的这个结婚，就是异性结婚顺利一些。”

研究者：“那您给孩子上户口也这么的麻烦吗？”

Sandy：“对的，我其实咨询了好几个派出所，但我不知道为啥我咨询了这几个，就我能上户的这几个派出所都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区嘛，可能我所在的区都比较严一些，我看他们有一些是在郊区，就是查得会不太严。因为他本来就要结婚证这些，如果你非婚的话，你就要出具很多资料什么的。然后有一些我看在知乎上或者其他社交平台，他们有说一些郊区就稍微轻松，就稍微放得宽一点，你稍微口头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爸爸，为什么没有结婚，或者怎么着就过去了。但是我这边我反正是提供了很多这个自己的资料、信息的，自己也亲自跑了好几趟，然后到包括派出所的人都直接亲自来家里看这个孩子，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孩子，还得让我妈去配合调查，完了还得证明我跟我妈的关系，反正就一系列的弄完之后总归是上完户口了，但生育保险这

³⁰ 高晓君, 魏伟. 2022. 女人当家? 单身生育和性别角色的重新协商. 《妇女研究论丛》171 (3):103-113.

³¹ 摘自魏伟指导的刘雨的硕士论文《女同性恋如何为人母? 当代中国的另类母职身份塑造与育儿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 2024.

个我报不下来，至今也没弄下来，我就想那就这部分钱就彻底放弃了。因为我给钱的损失倒无所谓，后面还可以再赚回来。因为我很着急这个事情，所以我在月子里就跑了三四趟派出所，然后最后就是出了月子，基本上就差不多办下来的。”

Sandy 在和派出所反复“唇枪舌剑”、来回博弈的过程中，最终失去了耐心放弃了生育保险、津贴相关的权益。由于缺失“父亲”的信息，Sandy 不仅无法领取生育津贴，本人甚至她的母亲还要经常出入派出所提交信息材料、配合调查，并且还出现了证明“孩子是我生的”、以及“我妈是我妈”这一系列荒诞的情节。权利需要争取，但是这个过程难以避免给性少数母亲增加了许多负担和麻烦，要大费周章地获得本应该享有的权利。

尽管目前生育福利的申领，主要涉及拉拉母亲，但从提供育儿照料的角度，男同父亲们处在相似的处境中。近年来为了进一步鼓励生育，减轻父母的育儿负担，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父亲参与育儿，在政策方面给予了更为积极的支持。在我们的访谈研究中，一些男同父亲对于不能同等享受相关的生育福利，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研究者：“作为独自抚养孩子的男同爸爸，你觉得你有没有资格去享受相应的生育福利？”

Dylan：“我看我肯定赞同是有资格的，但是现在没有享受到，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另一方面，可能很多 gay 爸也不觉得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特色不是爸妈带娃，而是爷爷奶奶带娃，所以这个问题对很多男士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在体制内工作的小雷，对无法享受相关的生育福利，觉得很无奈。

“因为我在体制内工作，说实话就是这个点，看上面怎么讲。首先，第一我没有结婚，就没有婚假，对吧？第二我是没有陪护假，咱们这些生小孩都没有陪护假的。这些东西是享受不到的，因为它这是法律规定的，咱也没办法。”

随着更多的同志在现有单身生育的法律框架下加入到为人父母的行列，享受和异性恋父母平等的生育权利，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拉拉母亲申领生育相关福利的诉求，和相关政策调整和变动的对接更为顺利，有望在政策领域内打开空间。相比而言，男同父亲主动要求申领生育相关福利的情况还很少见，因为传统性别角色和规范的影响，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多。此外，由于选择生育的男同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对申领相关福利的经济方面的动机不足；更为重要的一点，福利申领可能会导致个人和家庭在公共领域内“出柜”，这也是男同父亲放弃申请甚至考量相关生育福利的重要因素。

（四）子女教育

随着子女的成长，同志育儿家庭将面临更多与家庭之外的社会机构，包括幼儿园、学校、医院和居委会进行互动的情形。鉴于很多家庭的孩子已经到了入学年龄，我们对这些家庭及

其子女的校园经历开展了专门研究。除了研究 LGBT 父母的孩子的学业表现和社会适应外，来自西方的研究还集中在这些父母在学校环境中的经历，包括学校选择，以及基于教师、管理人员和其他学校人员如何对待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他们对排斥与融合的看法。³²由于普遍存在的异性恋规范，LGBT 父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于老师缺乏对不同家庭的敏感性，或者他们在学校里感到“不同”。³³ 预料到潜在的排斥或虐待，LGBT 父母可能会特别投入，在孩子的学校里拥有发言权，并努力为孩子提供更积极的学校体验，重点是在学校课程中纳入和提高对家庭多样性的认识。³⁴

相比直接出柜，参与我们研究的同志父母更多地采用“掩饰”(passing)的策略，按照异性恋正统性的要求构建家庭叙事（比如离异、配偶身亡等），进行符合异性恋正统性期待的公众形象管理。

“明年他们就要上幼儿园了，可能会有面试。我听说父母和孩子应该通过面试。我就说我离婚了。就像我们在泰国做的那样。我的婚姻是跨国的。他们的泰国（代孕）妈妈已经回泰国了，我自己在中国抚养孩子。”(Thomas)

“一定层面上会有需要一些解释工作，但现在的一些幼儿园什么的，对吧？老师都很开明的，他知道的你这个家庭。我觉得，比如说刚刚开始家访的时候，他会问家里面几口人什么，他会像查户口，然后母亲在哪里？我是直言不讳，说母亲在国外，他说母亲的名字什么，工作单位要不要写一写？我说母亲跟我们现在没有联系的，本身我也没有撒谎，对吧？对。没有联系的，靠不上了，那不要写了。其实，他懂的他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看到家里所有的照片，都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他可能对于妈妈的这种，我有的时候问他，我问儿子，我说妈妈去哪了，他说妈妈在心里，他跟我讲。”(达宁)

与同志父母们普遍采用的掩饰策略相对应，在当代家庭领域剧烈变迁，多样性趋势日趋显著的背景之下，学校也将学生家庭背景的差异纳入考量，从而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家校互动状态。

研究者：“幼儿园里面对这个大家都有妈妈？”

Nathan：“这个不一定。有很多离异的，也没有的。现在我们的国际幼儿园，相对来说国际幼儿园这叫 open 一点，大家不问私事，不问对方私事。而且我入园之前我也是跟老师都说过，我说人家是单亲家庭，所以有些方面可能你注意一下，别太让孩子受太大刺激了。”

研究者：“其实是和校方是有交流的？”

Nathan：“你必须要交流。他们有我的微信，他们可能也看出了我是什么样的人，

³² A. Goldberg and E. Byard. 2020. LGBTQ-Parent Families and Schools. In A. Goldberg and K. Allen eds. *LGBTQ-Parent Families Innovations in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2nd Edition) . Springer.

³³ A. McKee. 2022. “Is This Your Baby?": Gay Fathered Families' Experiences Navigating Heteronorma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9 (4): 677-698.

³⁴ M. Carroll. 2018. Managing Without Moms: Gay Fathers, Incidental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arental Gender.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9(13): 3410-3435.

但他们也没有问，他们有老是来我家喝茶的，都变成朋友了。”

“我认为我很特别，但老师们可能不这么认为。我儿子上过两所幼儿园，老师的反应都很正常。第一所幼儿园有很多可能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所以老师会避免谈论母亲节之类的事情，避免谈论你家里的女性亲戚，而不是只谈论母亲。这是一所私立幼儿园，老师很友好。自从儿子转到公立学前班读第二年起，我就担心会不会太死板。当我去填写登记表时，我需要提供爸爸妈妈的信息。我问老师如果我们家里没有妈妈怎么办。她说没关系，不需要填妈妈的信息。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有多特别。”（小雷）

“心照不宣”的策略虽然可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关注，但在不影响子女自尊和信心的前提下，如何构建一个内外一致的家庭叙事，也是这些家庭需要应对的首要挑战。

“他 10 岁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知道妈妈的事？”从学校的科学课上学来的。每个人都有妈妈，除了妈妈选择和你爸爸住在一起吗？你爸爸选了什么？这是个人的选择。（这和孩子上幼儿园或上学时说的话是一样的吗？）是的。我认为在我们家的情况下，这是非常有效的。我儿子从来没问过他妈妈在德国哪里。例如，我会说在法兰克福，但我没有详细说明。我的计划是等到他进入青春期或者我的父母都不在的时候，毕竟，这个故事应该是连贯的。你不能让你编的故事把事情搞砸。父母去世后，我会对儿子诚实。所有的真相，包括我的性取向，爱情和关系的故事，代孕等等。等他长大了能明白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所有的真相。”（Dylan）

相比掩饰的策略，另外一些同志父母选择直面家庭差异而在校园中出柜，包括扮演更为积极的倡导者的角色。

“我们第一次家长会的时候，我们就在班上跟老师都讲过了，所以，老师是秘鲁还是什么地方的人，具体我也记不清了。他们那个学校就是一个海归子女学校，相对就是文化层次和教育背景相对比较好一点，所以其实各方面，包容度应该很好吧，因为我们直接就是第一次家长会的时候讲，没有人觉得很惊讶什么的。因为我们要介绍家庭，我们跟小朋友也一直说，我们跟他讲，我们是两个爸爸，然后我们平时也会给他，有那种书，比方说 it's OK to be different，就是多种多样这种。还有就是以前律师给我们送的书，就是两只雄性企鹅养小企鹅的故事…对，其实他是很懂，但是具体，像妈妈这方面我们没跟他细讲，因为讲太深他也听不懂。他问有没有？我们说有，是在美国，但是生下来就带他回来了。老师也不错，我们讲了之后呢，应该是几个礼拜之前还给我们发邮件，是问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方面的书，她想就是到时候在学校那边讲家庭的多样性，比方说给小朋友讲，有的家庭是两个爸爸，或者两个妈妈，或者都没有只是爷爷奶奶。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有效，我们老大上上个礼拜有一天回来就说，我问他今天上了什么，把那个书带了去，他说老师给我们讲了每个人家庭都不一样的，就像我有两个爸爸，有的人是两个妈妈，有的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还有的就是只有爷爷奶奶。”（亮亮）

研究者：“你们有没有以一个 couple 的形式出现幼儿园的活动的？”

宏飞：“家长会我们都是一起的，对这次也是一起。比方说上次他们儿童节的活动，我们俩是一起的，但不是每次因为正好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工作是这样子。对，有时候会一起去。”

研究者：“你们是以 couple 的形式出现的，还是说各自两个小孩的各自的爸出现？”

燕清：“他们知道姐姐和弟弟是一家，所以也没有，我们也没说啥。”

宏飞：“没有去广而告之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去家长会是一起去的。”

燕清：“对老师其实也跟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就说他们也想至少他们的教职员里头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只是说小孩子如果真的在学校里头遇到这么多个小朋友的问题，可能学校的家庭就要一起帮他，免得他堆在心里，是我还是挺感谢他们这个老师的，因为她还是……”

宏飞：“对，但我觉得学校应该尤其是这种涉外的学校，应该更为 Inclusive。”

拥有这些更为正面和积极的校园出柜经历的同志父母，往往为子女选择的是更为昂贵的私立或者国际学校。除了相对更为开放的校园氛围，这些作为支付昂贵学费的顾客，也让他们在和学校的交往中拥有更高的协商能力。

同志父母直接出柜，也可能遭遇负面的经验。宏飞和燕清这对男同父亲，当试图将一对儿女转学到离家更近的学校时，就因为自身的性倾向问题被校方拒绝。

燕清：“我们本来想小班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我们家边上就有一个这种所谓的民办学校的国际部，还可以，当时我们就想早一点转过去，因为就走路就能到的这种距离，然后就尝试去递交了申请材料，然后也带着小朋友去面试了。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副校长一个外国人，是女性。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怎么弄？反正他说我们过两周给您通知，然后等等了一个多月没有通知。”

宏飞：“后来他们把我们拒掉了，简单说。”

燕清：“我就打电话给她，因为你没有直接跟她对话，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打电话到招办的老师，他欲言又止，然后我觉得他甚至这样给我打电话的，他说我们是一个 very conservative community，什么说了一堆。然后这个话也是我至少打了三次电话以后，因为马上就要到下学期了，我得知道孩子是继续留在这个学校还是到另外一所学校。但是因为后来他们就把我们拒掉以后给他们校长还写了一封信，我说我觉得特别不 fair。你们如果觉得这是个 problem 的话，应该一开始就告诉我，不应该又欲言又止，我不觉得这是值得我 shame 的一件事情。然后校长给我回了封信说他也觉得他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更加 open，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们的网络调查中，询问了性别多元家庭在生养孩子过程中所遇到主要挑战。尽管选择不同生育方式的父母，面临的挑战不尽相同，但都将“在恐同的环境中抚养孩子”列为最为主要的挑战之一。³⁵对同志父母的深度访谈研究显示，在目前异性恋正统性主导的社会环境之下，父母普遍选择了“掩饰”的策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急剧变迁的背景之下，中国社会的异性恋正统性的运作也开始遭遇更多的挑战，不仅为同志父母的“掩饰”策略的

³⁵ 魏伟，汪佳瑜. 2022.《中国性别多元群体生育实践调查报告》。

运用创造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言宽容”状态，也为一些父母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开展更为积极的倡导行动提供了可能性。

五、政策倡导的可能方向

（一）辅助生殖技术的合法使用

在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和国内人口政策调整的推动下，中国同志社群近年来涌现了一个生育潮，但是我国现有法律将性少数群体被排除在辅助生殖技术适用范围之外。为了规避相关限制，一些同性伴侣或者个人前往允许其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育，但通常费用昂贵，也需要面临目的地国家法律变动的风险；另外一些伴侣借助非正规渠道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进行生育，但此种做法脱离法律监管，存在极大的法律、财产和安全风险。

对于同志群体而言，生育的实现在追求个人性自主和满足家庭期待之间达成了较好平衡。我们的研究显示，生育子女的生活选项在社群内部变得更具吸引力，存在大量的需求，也期待政策方面的支持。为了实现同志群体的生育权利，政策倡导的方向是取消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婚姻状况限制，并为相关使用建立配套制度。对于社会道德伦理争议较小的辅助生殖技术，比如使用精子库和医疗机构配套生育医疗服务，争取获得平等的准入支持。对于社会道德伦理争议较大的技术运用，特别是代孕，需要引入更为积极和全面的生育公正的框架。来自社群的新的研究表明，性少数群体生育权的实现和生育服务提供者的福祉保障之间并非零和的关系，“符合伦理精神的代孕”（ethical surrogacy）能够在性少数意向父母和承担生育服务的女性之间建立联系和关怀。³⁶商业性代孕生育的顺利进行，除了良好的劳动报酬和工作条件，双方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基于委托服务的同志父母对于生育帮助提供者的感激和尊重，充分承认后者身体性劳动的意义。在实践层面，父母与通过代孕生育的孩子们分享捐卵者和代孕者的积极信息，在成长过程中保持联系，并为代孕者和捐赠者她们自己的家庭组建和维护提供经济和情感的支持。

（二）进一步消除户籍登记的障碍

尽管存在巨大的生育需求，户籍制度的限制是制约同志群体生育需求释放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障碍。2015 年伴随计划生育政策废除的户籍登记改革，去除了婚内生育的要求，成为之后推动同志社群出现生育潮的重要制度性推手。基于我们的线上问卷调查和线下访谈调查，同志育儿家庭子女的户籍登记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但是，研究也发现在政策执行层面，仍然存在不足：一方面，通过领养方式养育子女的同志家庭，面临普遍的户籍登记困难；另一方面，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同志家庭，由于不能提供婚姻和父母双方的信息，在有的地区还存在登记流程复杂，耗时较长，甚至遭

³⁶ Men Having Babies, “A Framework for Ethical Surrogacy for Intended Parents,” 2016-09-06, <http://www.menhavingbabies.org/advocacy/ethical-surrogacy/2015>, 2022-05-11.

遇刁难的情形。在国家鼓励生育的背景之下，推动同志育儿家庭户籍登记障碍的进一步消除，包括出台一些更为积极的引导性措施，有了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三）推动同志育儿家庭生育福利的申领

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是近期我国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最新举措。按照对这一新政的权威解读，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尊重生育主体。除了支持已婚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相关领域的学者也建议包容性生育政策还应当考虑包容单身生育。这一建议的背景是目前围绕女性的单身生育的政策倡导已经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除了引起关注和报道的生育保险外，围绕生育假期、育儿津贴、照料服务和生育主体的劳动权益等后续福利的提供和社会保障的跟进，也列入了政策倡导的议程和目标。

作为法定未婚者的同志群体，他们作为生育主体的权利也得到应有的尊重。除了少数拉拉母亲，同志群体对于生育相关福利的申领尝试不多。鉴于相关议题的当前社会具有的关注度，同志群体的加入，除了获得平等和切实的利益，也有助于破除相关政策制定和贯彻方面的异性恋假设，推动社会层面多元性别意识的提升。此外，围绕单身生育的倡导，在现有政治空间之下，也是为数不多可以开展的议题，其中显现的不同群体为了共同目标而展开的联盟组建和策略协调，都是值得积极探索的领域。³⁷

（四）营造对于同性家庭及其子女成长友好的社会环境

随着同性育儿家庭中的孩子的成长，如何营造一个对于这些家庭及其子女成长的友好的社会环境，是同志社群需要应对的新的课题。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社会家庭多样性的趋势得到了普遍的认识和尊重，为这些家庭及其子女的社会适应和接纳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家庭仍然需要面对异性恋规范对于他们养育子女带来的挑战，比如子女就读学校缺乏多元性别的教育和意识，媒体再现不能反映同性家庭的现状，和社会支持网络不足等诸多问题。

促进同性家庭的包容与平等，需要采取多头并进的方法，包括法律、社会和文化变革。它还需要学校、工作场所、医疗保健提供者和媒体的积极参与，以培养一种对同性育儿家庭更为包容和接受的社会文化，从而保障生活在这家家庭的孩子的健康成长。从政策倡导的角度，尽管绝大多数同志父母并非传统意义上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是为了子女的自尊和成长，他们会选择站出来，成为倡导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行动者。³⁸

³⁷ D. Wang. 2022. Differential Coalescing: Re-Building the Coalition for 'Single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I:10.1080/10670564.2022.2108680

³⁸ Carroll. 2018.